

“中庸”剖判

——简论孔子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时代特征

李德永

“中庸之道”，或“中道”、“中正”、“中和”，或更简括为“中”，是孔子首先制定的一个哲学范畴，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孔子对“中”或“中庸”的涵义作过颇为确切的规定；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子思和孟轲又对“中”或“中庸”作了颇为精到的发挥，因而被宋代唯心主义思想家程颢、程颐称之为“孔门传授心法”，乃至形成了一条在历史上颇有影响而又颇具特色的形而上学思想路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反中庸”与“道中庸”，是中国哲学史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利用孔子的中庸之道大做文章。老的修正主义者如陈独秀之流把它视为至宝，吹捧美化，用折中主义来冒充辩证法，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新的修正主义者如“四人帮”之流则把它当作靶子，假批影射，用绝对主义来冒充辩证法，攻击两点论，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折中主义、绝对主义等形而上学的理论界限，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必要对孔子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一番历史的解剖和批判。

中庸之道的政治倾向

孔子鼓吹尧舜是“允执其中”的老祖宗（《论语·尧曰》），孟轲又说成汤“执中”（《孟子·离娄下》），显系伪托。其实，孔子及其中庸之道都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孔子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出现在新旧社会代谢还处于方生未死的春秋时代，并非偶然，而他能够提出中庸之道作为自己的政治代数学，也绝非偶然。

春秋时代的社会矛盾运动，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

“四人帮”只用“礼坏乐崩”四个字作出断然判断，把复杂的社会变化简单化，根本拒绝当时历史运动的总趋势和各国的特殊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是“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猖獗”在时代分析上的具体表现。

虽然从总的形势来看，春秋末期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时期。但从各国具体情况来看，变革途径和发展速度却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齐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开始于管仲相齐时期自上而下的革新运动，完成于田氏取齐时期由下而上的夺权斗争，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鲁国旧的传统势力比较大，新兴地主势力采取瓜分公室的急剧变革途径，经过一百多年才完成从土地制度到赋税制度的改革（前五九四年“初税亩”——

前四八三年“以田赋”)。郑国外有晋、楚两霸的强大压力,内有“族大宠多”的层层阻力;但以子产为代表的改革派采取分化旧贵族、争取工商业和土地私有者的策略,只用六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从土地制度到赋税制度的改革(前五四四年“作封洫”——前五三八年“作丘赋”)。当时各国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反映到经济制度、阶级关系、政治派别、意识形态等方面,就是新旧矛盾的交互影响和反复斗争。孔子出身鲁国而又周游列国,复杂多变的时代形势对他的思想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不把孔子放到春秋末期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不对这个特定时期的发展形势进行具体的分析,就难以对他的中庸之道的提出及其作用作出恰当评价。

孔子的中庸之道究竟适应奴隶主阶级中那个阶层的政治需要呢?

“四人帮”首先给孔子戴上“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的帽子,然后棍棒乱飞,把孔子宣布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顽固的守旧复古派”、“十足的翻案复辟狂”等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孔丘其人》、《再论孔丘其人》)根本拒绝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分化情况及其政治派别进行具体分析。这是“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猖獗”在阶级分析上的具体表现。

其实,春秋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在奴隶、平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强力打击下,有的下降为平民,有的转化为地主;而从奴隶主向地主的转化也具有不平衡性。只就鲁国三家而论,“三分公室”时,季孙氏采用封建制(“尽征之”),叔孙氏沿用奴隶制(“臣其子弟”),孟孙氏则新旧参半(“取其半”)。直到“四分公室”时,三家才全部采用封建制(“皆尽征之”),整个从奴隶主阶级转化过来了。正因为分化瓦解的程度不同,奴隶主阶级内部才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有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顽固派(右派),有归附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左派),有依违于两者之间的维新派(中间派)。而维新派则具有很大程度的摇摆性:在一定条件影响下,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庄子·寓言》)可见在新旧蜕变开始激化、但尚未很成熟的历史阶段,孔子的摇摆性是很大的。这就使孔子思想及其作用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某种适应性和历史合理性。如果把当时处于方生未死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时代特征简单化,就难以对孔子中庸之道的阶级实质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否具有两重性呢?

“四人帮”抓住“克己复礼”四个字大做文章,从此引伸出“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性”、“拚死反攻倒算的疯狂性”、“玩弄鬼蜮伎俩进行反扑的欺骗性”,说什么“除了复辟,再也搞不出别的名堂来。”(《再论孔丘其人》)总之,孔子是个极端的顽固派,他的中庸之道只具有反动的一重性,一棍子打死就够了,用不着进一步对其思想矛盾进行剖析批判。这是“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猖獗”在思想分析上的具体表现。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3页)孔子处在变革的时代,出身没落的阶级,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矛盾问题,他的思想矛盾及其主要的政治倾向是应该认真分析的。就阶级立场而论,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矛盾是交

错综复杂的。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对于奴隶的反抗斗争，孔子的态度是“‘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这种调和立场反映到政治态度上就是在“仁”和“礼”这两个范畴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一方面，他主张“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强调用调和的办法来处理矛盾、恢复礼制；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强调用礼制的标准来规范行动、约束自己。既要“为仁由己”（同上），微弱而又曲折地多少反映了从奴隶制束缚下摆脱出来的积极性的一面，又要“克己复礼”，把这点微弱的积极性闷死在沉重而僵死的礼制框框之中。正是这种活的要突破死的、死的又抓住活的现实矛盾，决定了孔子中庸之道的思想矛盾及其主要的政治倾向。

“四人帮”用一点论顶替重点论，攻击两点论，不可能对孔子思想作出经得起历史事实检验的政治分析，从而只会歪曲其本来面貌，掩盖其以“执中”为形式、以“复礼”为内容的特殊性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孔子中庸之道的主要政治倾向及其形而上学的思想特征，进行科学的剖析和批判。

中庸之道的思想特征

“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问题是这种思想的发展，仍面临着两条路径：或者是正视现实，如实反映客观矛盾，走向辩证思维；或者是害怕现实，掩盖、歪曲客观矛盾，走向形而上学。

面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矛盾运动，哲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围绕着哪些问题展开的呢？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怎样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第一，关于变与常

事物是不是发展的？事物是怎样发展的？这是当时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史墨为代表的改革派，反对把王权神圣化、永恒化的形而上学不变论，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变化观得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政权转化论。他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垮台毫不怜惜（“其谁矜之！”），而把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看成是理所当然（“不亦宜乎！”）。这种敢于正视变局、主张迎变反常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反映史墨所代表的归附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积极态度。

老聃提出了“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的矛盾转化观点，承认“物壮则老”（第三十章）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但他时刻怀着“将恐灭”（第三十九章）的忧虑，幻想通过“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的办法来“归根”、“复命”（第十六章），苟延残生。这种惧变求常的思想，反映老聃所代表的已经没落下来的奴隶主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消极态度。

以孔子为代表的维新派采取什么态度呢？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他既没有史墨那样多的积极性，也没有老聃那样多的消极性，而是调和折中于两者之间。一方面，他主张“毋固”（《论语·子罕》）、“疾固”（《论语·宪问》），反对知常而不知变的顽固派，不仅承认周比夏商两代发展的历史事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甚

至憧憬着新的一代胜过老的一代(“后生可畏,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这多少反映了他的思想的积极性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 他对于当时的急剧变革又产生了“从众”与“违众”的矛盾(《论语·子罕》); 随大流吧, 就会变而不保其常, 同奴隶制发生尖锐矛盾; 逆潮流吧, 又会常而不通乎变, 与封建制发生尖锐矛盾; 调和的办法是立足于既守常(“可与立”)而又通权达变(“可与权”)。他认为只要把守常的原则性与通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就会象水一样的回旋于险阻之地, 又会象山一样的耸立于天地之间(参见《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篇》关于《论语·雍也》: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的解释)。这种执常以应变、变而不失其常的权变论, 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奴隶主维新派应付当时社会变革的机智态度。

但是, 事物的常住性毕竟是相对的。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革命洪流面前, 被永恒化为“百世可继”的奴隶制将被冲毁, “善复古, 讯易常”(《春秋繁露·楚庄王》)的《春秋》只得绝笔。这是历史的喜剧。

第二, 关于和与同

春秋时期是社会矛盾运动多方开展和蓬勃发展的变革时期。对待社会矛盾到底采取什么态度? 是强调对立的统一(“和”)来处理矛盾, 还是鼓吹绝对的等同(“同”)来掩盖矛盾? 这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发展的过程中, 一些具有改革倾向的政论家为了为新兴势力争取发言权、参政权, 曾提出“和实生物”(史伯语)、“相反相济”(晏婴语)的观点, 反对奴隶主贵族排斥新兴势力的独裁专制, 主张在调整财产和权力不平衡的旧的等级关系的基础上, 重新组织能够容纳、联合新的势力的新的平衡关系(“以他平他谓之 和”——史伯语)。随着斗争发展的需要, 史墨更提出了“物生有两”的观点, 强调矛盾的对立(“皆有贰也”), 主张通过斗争(“雷乘乾”)来实现财产和权力的转化(“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从承认对立的统一(“和”)到强调矛盾的对立(“两”), 从组织新旧平衡(“平”)到实现新陈代谢(“乘”)。这些素朴辩证观点的提出和发展, 是当时思想战线的一场哲学革命, 对当时的政治变革起了先导作用。

老聃从正反较量、强弱转化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矛盾斗争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提出了“祸福倚伏”、“高下相倾”的辩证观点; 但是历史辩证法发展的结果, 却使他所代表的阶级成为“弃人”(《老子》第二十七章)。为了挽救被遗弃的命运, 他妄图“挫锐”、“解纷”、“和光”、“同尘”, 逃向无矛盾、无斗争的“玄同”境界(《老子》第五十六章)。老聃的思想矛盾是当时处于没落地位的奴隶主阶级性格的典型反映。

孔子对矛盾采取什么态度呢?

时代已把孔子推进了矛盾的漩涡。“玄同”矛盾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而开展斗争更会带来难于接受的结局。为了应变以守常, 他便致力于新旧矛盾的调和。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途径, 他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论题, 对史伯的“和同”范畴进行了实质性的颠倒与改造。史伯的“和”是“以他平他”, 不仅强调统一是矛盾的统一, 而且强调通过“讲以多物”的积极竞争, 在开展矛盾的基础上来重新组织新的平衡; 而孔子的“和”则是“以礼节之”(《论语·学而》), 不仅强调统一是和谐的统一, 而且强调通过“攻乎异端”(《论语·为政》)的消极防范, 在限制矛盾的基础上来继续维持旧的平衡。因此, 在和与同的关系问题上, 史伯的“和实生物”论, 透露的是推陈出新的新意, 其积极性在于

纳新，而孔子的“和而不同”说，装点的却是温故知新的旧章，其消极性在于守旧。从哲学斗争的形势来看，孔子是在沿用史伯“和同”范畴的形式下，偷运形而上学的矛盾和谐论，反对史墨“物生有两”的矛盾对立论；而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看，他是想用这种和谐论来调节、缓和当时日益激化了的社会诸矛盾。一方面，大讲“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无所争”（《论语·为政》），而把所谓“君子之争”局限在“争而不斗”（《论语·季氏》：“戒之在斗”）的范围内，以缓和新旧统治者之间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看到“好勇疾贫”（《论语·泰伯》）的革命愤火到处燃烧，建议统治者用“惠而不费”（《论语·尧曰》）、“威而不猛”（《论语·述而》）的软硬两手来有利有节地处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外部矛盾。这种贵和以息争、争而不伤其和的矛盾和谐论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维新派的狡黠智慧。

第三，关于因与革

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新旧社会的交替，还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社会变革的方式，是推陈出新的革命，还是斟酌损益的改良？这是当时思想战线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铸刑鼎，夺君权，改革田制，瓜分公室，这是对奴隶主采取的暴烈行动，也是对奴隶制进行的根本变革。史墨把君臣易位的社会变革看成是“自古已然”的历史规律，把以卑凌尊的革命行动提高到“天之道也”的哲学高度（《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了用革新方式促成社会变革的深刻的哲学内容。

老聃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在“飘风骤雨”的冲击下沦落下来了。继承吧，已无业可守，无贵可尊；革新吧，又处于被革的地位，越革越对自己不利。他们已感到无力从事严重的政治斗争了，只能把对新统治者的仇恨升华为超脱礼法的虚无主义，把对昔日天堂的留恋寄托于“小国寡民”式的乌托邦。他们失去了过去，没有了未来，从因与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游离出来了。

史墨代表从下层冒上来的新兴阶层，他们充满着破旧立新的自信心；老聃代表从上层垮下来的没落阶层，他们只能走“功成身退”（《老子》第九章）的下坡路；而孔子则代表奴隶主阶级中还拥有一定实力的中间阶层。与新兴阶层比较起来，他们缺乏积极性而富于保守性，与没落阶层比较起来，他们又缺乏幻想性而富于现实性。他们既然手头有点东西，心中自然增加了顾虑，在新旧交替之际，前瞻后顾，进退为难：不革吧，大势所趋，无法回避；革吧，得少失多，又难于接受。他们的哲学是：不可不革，又不可太革。因此，对待社会变革，强调的主要是继承（“因”），而不是革新（“革”）；对待革新活动，害怕的主要是“过”，而不是“不及”。为了防止极端行动对于他们的实际利益所造成的危害，他们不仅主张“贵和”，用调和的办法来缓和矛盾，而且强调“执中”，用折中的办法来约束行动。孔子看到：“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勇敢的行动如果不用礼制来约束规范，超过了被当时社会制度所容许的界限（中），就会出乱子，其结果将会引起社会的根本变化。所以他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过于革新和过于守旧，都是对立的两个极端；把这两个极端统一、折中、均衡起来，在革与守之间寻找一种合力，对旧的社会制度，在以继承（“因”）为主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损益”，减减增增，修修补补，使旧的一套得免于死亡。这种统一两端的方法，叫做“用

中”；按照这种方法所采取的所谓“无过不及”的行动，叫做“中行”，掌握了这套“执两用中”的方法，就有了如同《大学》所谓弥缝于“上下前后左右”的“絜矩之道”，“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地从容周旋于各种矛盾之中，而成为“无时而不中”，也就“无入而不自得”的圣人了。孔子及其继承者所宣扬的这套“无上甚深微妙法”，剖析其哲学内容，不过是以折中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其抽象化了的所谓“中”，不过是决定事物具有某种质量的关节点；还原其阶级内容，就是约束人们行动的“礼”；既然如此，“中”就成了不可逾越的“矩”或“度”；而从维护礼制的角度来看，这种“不逾矩”或“不过度”，就是具有“合理性”的“义”；而一切言论行动，或可，或不可，或肯定，或否定，就都要以此为准了。这本来具有极为鲜明的阶级性，但由于它披上了“中道”、“中行”等等外衣，既反对“执一”（《孟子·尽心上》），貌似全面性；又反对“乡愿”（《论语·阳货》），貌似原则性；又标榜“时中”（《中庸》第二章），貌似灵活性；这就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因而在政治、理论斗争中就可以发挥其不可低估的特殊作用了。

总之，不否认变化，但以常为本来控制变化；不否认矛盾，但以和为贵来缓和矛盾；不否认革新，但以中为度来限制革新。这就是孔子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特征。

中庸之道的历史影响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调和折中之道，即使它具有宁右勿左的政治倾向，但在新旧交替的春秋末期，不仅新兴势力嫌它太右，腐朽势力也嫌它偏左。所以孔子一再哀叹“道之不明”、“道之不行”（《中庸》第四章），埋怨他的中庸之道不被新旧两方所理解，所接受。但为什么到了封建制建立后，中庸之道又成了历代统治者“不可须臾离”的法宝了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的容忍态度便于用来维护温情脉脉的宗法血缘关系以强化封建统治；又如，“贫而无怨”（《论语·宪问》）的中和思想便于用来掩盖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熄灭劳动人民的革命怒火；再如，“因革损益”的改良主义，便于用来调整某些环节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这种思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生活在同一封建生产方式下而具有革新倾向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这些都说明，中庸之道在封建社会具有多方面的适应性。

特别是作为思想武器来看，中庸之道更具有精巧圆滑的理论特征。本来，否认斗争和发展是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但以庄周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是通过夸大运动变化的绝对性，宣扬无条件的转化论，来取消斗争、否认发展的。这种以相对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由于在政治观上宣扬无为论，在认识论上宣扬怀疑论，在一定条件下容易被利用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给封建统治带来破坏和不稳定的危险因素；而孔子的中庸之道则具有比较大的保险系数，因而被历代封建思想家继承发展成为具有以折中主义为理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例如，在变与常的关系问题上，折中主义既不笨拙地反对保守，也不坚决地主张变革，而宣扬一种“能常而后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朱子语类》卷九四）的权变论。这种变，“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汉书·董仲舒传》）便于封建统治者守常以应变，变而不失其常。又如，在和与同的关系问题

上，折中主义既不笨拙地否认矛盾，也不坚决地主张斗争，而是把封建社会“不和之甚”的对立关系加以调整、粉饰，美化为“各得其宜”、“各得其利”的和谐关系（《朱子语类》卷六八），便于封建统治者贵和以息争，争而不伤其和。由于中庸之道企图用这套调和折中的办法来息天下之争，止名教之变，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它当作“圣圣相承”的“心法”，不断地进行理论加工，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一定理论形态和发生深远历史影响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

中庸之道既然以调和折中为其理论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矛盾着的两重性，在其僵死的思想体系中含有一些被窒息、被歪曲了的真理颗粒。这些颗粒在一定的气候和土壤下，可能从硬壳中萌发出来，露出一线微弱的生机。例如康有为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就曾从孔子有关因革损益的“微言”中，发挥“托古改制”的“大义”，反映当时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要求从封建主义禁锢的裂缝中突破出来以缓慢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倾向。但是康有为的积极性及其所利用的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他只能假托孔子来维新帝制，而且被他一度资产阶级化了的、涂抹了稀薄民主色彩的新孔子，迅速复归还原为反对任何民权平等、死守三纲五常的旧孔子。这充分说明孔子中庸之道的保守体系严重地窒息着其中某些积极因素。所以从总的情况来看，孔子中庸之道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消极反动的，而不是积极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主要的在于对孔子的中庸之道进行批判的总结，在批判总结中肃清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

但是，“形而上学猖獗”的“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大批判的理论权威”，假借批判中庸之道来放肆地宣扬绝对主义，别有用心地败坏马克思主义“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在常与变的关系问题上，孔子通过夸大事物常住性的相对性来凝固质的规定性，“四人帮”则通过夸大事物变动性的绝对性来否定质的规定性；在和与同的关系问题上，孔子通过否认斗争的绝对性来调和矛盾，“四人帮”则通过否认统一的相对性来歪曲斗争；在因与革的关系问题上，孔子通过夸大新与旧的联系来抵制革新，“四人帮”则通过夸大新与旧的差别来否认继承。总之，过去的孔子用宁右勿左的折中主义为旧制度祝福，现在的“四人帮”则用宁“左”勿右的绝对主义向新制度捣乱。右倾机会主义者曾企图用宁右勿左的折中主义来扼杀革命，及至扼杀不了，“四人帮”又改用宁“左”勿右的绝对主义来棒杀革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同折中主义的斗争发展到同绝对主义的斗争，充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时期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复杂性。

只有从理论上既划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同折中主义的界限，又划清其同绝对主义的界限，才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总结哲学斗争和继承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正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批判精神，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